

ishmael beah
伊斯梅尔·比亚

于海江 译

长路漫漫

a long way gon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K837.12/310

2008

ishmael beah

[塞拉利昂] 伊斯梅尔·比亚 著

长路漫漫

a long way gone

memoirs of a boy soldier

一个童兵的回忆

于海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路漫漫：一个童兵的回忆/(塞拉利昂)比亚(Beah, I.)著;
于海江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8.1
书名原文: A Long Way Gone: Memoirs of a Boy Soldier
ISBN 978-7-5327-4432-9

I. 长... II. ①比...②于... III. 自传—现代
IV. K837.1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3824 号

Ishmael Beah

A LONG WAY GONE: MEMOIRS OF A BOY SOLDIER

Copyright © 2007 by Ishmael Beah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rah Crichton Books, an imprint of
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09-2007-899 号

长路漫漫

一个童兵的回忆

A Long Way Gone;

Memoirs of a Boy Soldier

Ishmael Beah

伊斯梅尔·比亚 著

于海江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张 颖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21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432-9 / I · 2499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628900

谨以此纪念

母亲，父亲，

哥哥和弟弟。

你们的精神与我同在，

给我力量坚持下去，

献给塞拉利昂所有

被剥夺了童年的孩子，

纪念瓦尔特·(沃利·)朔伊尔

感谢他那慷慨怜悯之心

感谢他教我以规矩

使我成为一个懂礼有节之人



美国纽约市，一九九八年

我中学里的朋友怀疑我没有讲出自己的全部身世。

“你为什么要离开塞拉利昂？”

“因为发生了战争。”

“你亲眼见到过打仗吗？”

“我们国家人人都见过。”

“你真的看到人们端着枪互相射击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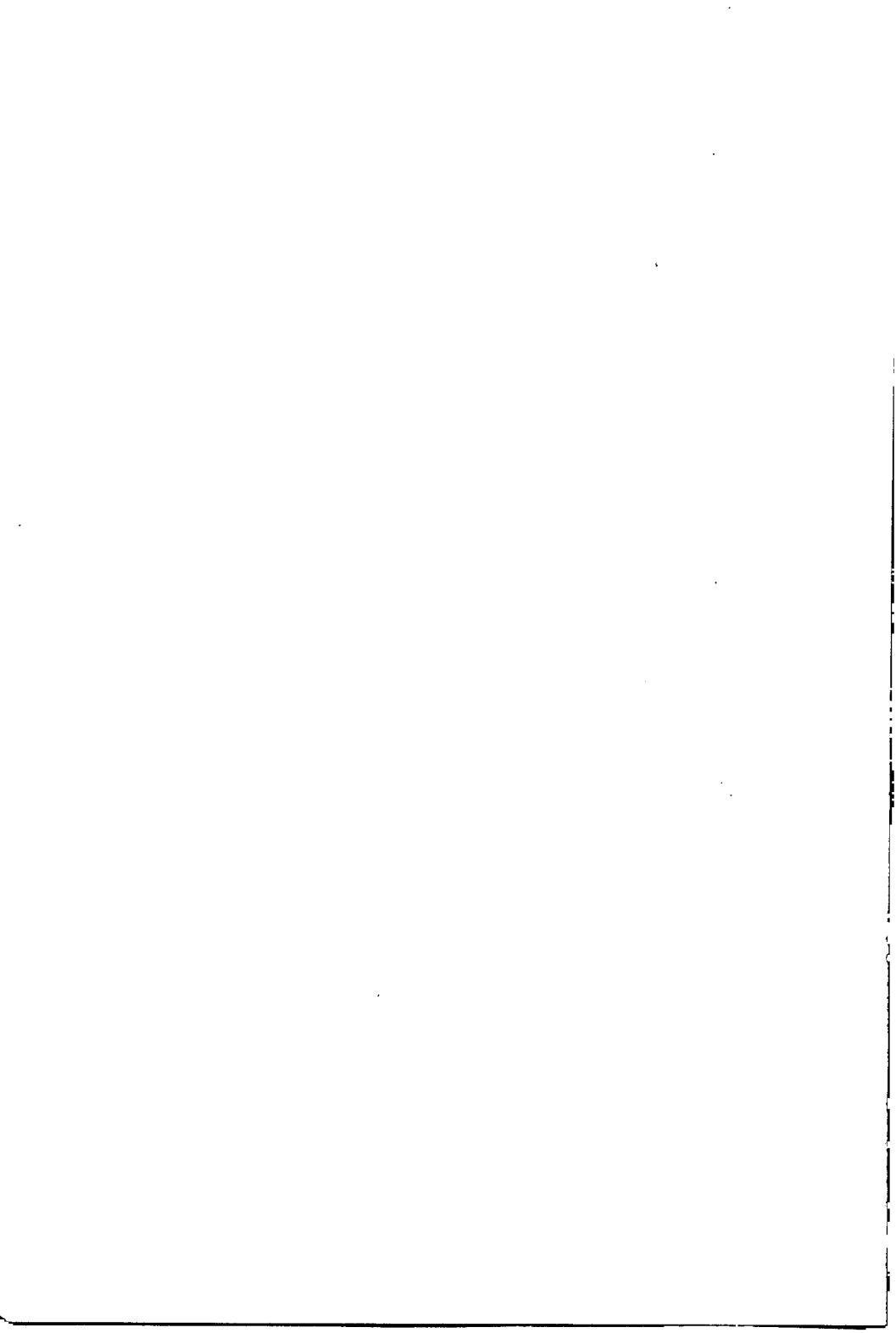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啊，常有的事。”

“太酷了。”

我浅浅地一笑。

“有空你得给我们讲讲。”

“好啊，是得讲讲。”



—

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,沸沸扬扬,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。直到有一天,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,人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国家真实地发生了。那些从数百英里之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,房子如何被烧毁。有人出于同情,要他们住下来,但大都被谢绝了。他们说,战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。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,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声音,就会吓一大跳。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交战区来的成年人同我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,常常精神恍惚。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,他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,精神受了刺激。那些事,即使他们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,我们也不会相信。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。我所知道的战争,不过是书中读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,比如说《第一滴血》,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。我那时才十岁,凭我的想象力

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。

我第一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。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，我和哥哥朱尼尔、好友塔洛伊离开家，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的才艺展示。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。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来，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。我八岁那年，我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。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说唱乐。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，莫宾比是那家公司的外国人的居所。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，看大彩电，还能看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。有一天晚上，电视上播出的是一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。我们四人坐在那里，被这支歌迷住了，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。片子播完时，屏幕下方跳出了一行字，“Sugarhill Gang：《快乐的说唱者》”。朱尼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每隔一周的周末都到那个房子里去看电视，学唱那种歌。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，但印象却十分深刻。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，那么有节奏。

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，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事情。假期里，他带来了磁带，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，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种舞叫“嘻哈”。我非常喜欢这种舞，更喜欢学说那些节奏明快的歌词，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。有一天下午父亲回家时，我和朱尼尔、穆罕默德、塔洛伊正在学 Eric B. & Rakim 的《我知道你有心》。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，哈哈笑

着问道：“你们说些什么，自己能听懂吗？”朱尼尔还没答腔，他就走开了。他坐在芒果树、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，把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。

“听，这才是标准英语。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，”他在院子里大声喊。

父亲在那里听新闻。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。我们左右脚轮番踏步，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后，手臂、上身和头部也要同时移动。“这个动作叫‘跑步者’，”朱尼尔说。我们模仿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。然后分手，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家务活。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，“安息，孩子”，或者“我闪了”。屋外，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。

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，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一背包，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。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裤，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，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、T恤衫和球衣。一般要穿三双袜子，袜筒卷起来，让运动鞋显得很膨大。白天天气太热时，就脱掉几件，搭在肩膀上，样子很时尚。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。因为打算第二天就回来，我们跟谁都没有告别，也没有说要外出。没想到，这次一离开家，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为了省钱，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。那是个明媚的夏日，太阳不是很毒，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，开开心心，追追打

打，路也不觉得很远了。我们带了弹弓，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的猴子。有几次遇到河流，还停下来游泳。有一条河上架着桥，我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，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。我第一个出了水，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。他俩以为在车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，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，于是掉过头，撒腿往河里跑，刚跑到桥中间，车就追了上来。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笑，司机按响了喇叭。太好玩了。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，但没有得逞。

下午两点，我们到了卡巴提，我外婆的村子。人们管我外婆叫玛米·卡帕纳。她个子高高的，一双棕色的大眼睛，与长长的脸型搭配得漂亮匀称。站着的时候，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，就是抚在头上。一看到她，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、雪白的牙齿和脖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，就是“老师”的意思。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。

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又上路走最后六英里。外婆想留我们过夜，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。

“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？”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，又充满了担心。

“你又不上学，去马特卢章干什么？怎么这么瘦啊？”她问个不停，但我们避而不答。她送我们到村口，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。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，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别。右手代表好运气。

几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，见到了吉布里亚、卡洛科、卡利鲁等老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去了博城公路，那里卖食品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。我们买了些煮花生，一边吃一边讨论第二天的活动，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，先搞个排练。睡觉是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。屋子很小，只有一张小床，我们四个人（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）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，腿和脚耷拉到床下。因为我个子最小，身体基本能蜷缩到床上。

第二天，我和朱尼尔、塔洛伊待在卡利鲁家里，等候朋友们下午两点放学回来。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。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，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，由我数数。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走到露台上，也加入了比赛。塔洛伊喘着粗气，一字一句地问他们怎么回来了。吉布里亚解释说，老师说了，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布维莫了。学校停课，让大家听候通知。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那里。

据老师说，当天下午，叛匪攻进了矿区。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。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，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子，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。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校、河边、水塘寻找孩子。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，父母却在满街跑着找孩子。枪声渐渐密集起来，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，匆匆逃出了镇子。

“老师说了，这个镇子是下一个进攻目标。”吉布里亚从水泥地板上站起身来。我和朱尼尔、塔洛伊拿起背包和朋友们一起

向码头走去。人们正在从矿区向这里聚集。有些人我们认识,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人在哪里。他们说进攻来得很突然,一片混乱,大家都不知所措,四散逃命去了。

我们在码头上待了三个多小时,急切地盼着能见到家人,或者找到一个见过他们的人。但一点消息也没有,而且过了一会儿之后,那些过河来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。那天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。太阳平静地穿过白白的云层,鸟儿在树上鸣唱,树在微风中摇曳。真无法相信战争已经来到了家门口。我觉得这不可能。我们头天离家时,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叛匪就在附近。

“怎么办?”吉布里亚问道。没人答话。过了一会儿,塔洛伊打破了沉寂。“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家人,否则就来不及了。”

朱尼尔和我点头同意。

仅仅三天之前,我还看到父亲踱着方步收工回来。他那顶安全帽夹在胳膊下,那张长脸在下午酷热的阳光下淌着汗。我就坐在露台上。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,因为新来的继母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但那天早晨,父亲上楼时对我笑了笑。他端详着我的脸,双唇嚅嚅着像要说点什么,这时继母出来了。他忙转过身去看继母,继母装作没看见我。他们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客厅。我强忍住眼泪离开露台,去和朱尼尔会合,在那里等卡车。我们要去三英里外的邻镇看望母亲。以前父亲出钱供我们上学,放假回

家时在周末去看她。如今父亲拒绝给我们付学费，我们失学后每隔两三天就去看望她一次。那天下午我们在集市上找到了她，跟她一起买了些菜，好给我们做饭。那天见面时母亲脸上表情木然，但一和我们拥抱，立刻有了神采。她告诉我们，小弟弟易卜拉欣上学了，从集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会去接他放学。她拉着我们的手，一路上不停地回头看，好像怕我们走丢似的。

去小弟弟的学校的路上，母亲转过身对我们说，“这阵子还没有钱让你们复学，心里很难过。我正在想法子。”她停了停，又问，“你们父亲还好吗？”

“他还好。我下午还看到他了，”我答道。朱尼尔一言不发。

母亲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父亲是个好人，他很爱你们。只不过没给你们找个好心肠的后妈。”

到学校时，小弟弟正在和伙伴们踢足球。他才八岁，球技已经相当不错。一看到我们，他就跑过来，扑到我们怀里。他跟我比了比个头，看看是不是长得比我高了。母亲笑起来。弟弟的小圆脸红扑扑的，汗水蓄在脖子上的皱褶里，跟我母亲一样。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母亲的屋子。我握着小弟弟的手，他给我讲学校里的事情，还要晚上和我赛足球。我母亲还是单身一人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照料易卜拉欣上。她说，小弟有时会问起父亲。我和朱尼尔在外上学时，她曾经带他去看几次父亲。每次看到父亲拥抱易卜拉欣，她都要哭，因为父子俩见了面都很高兴。母亲好像陷入了

沉思,想到这些,她脸上洋溢着笑。

那次看望母亲之后又过了两天,我们就离开家了。我站在马特卢章的码头边,仿佛看到父亲手拿安全帽从工地跑回家。看到母亲哭着往小弟弟的学校跑。我一下子颓丧起来。

我和朱尼尔、塔洛伊跳上一条小船,伤心地告别了好友。小船驶离了马特卢章的河岸。我们来到河对岸时,更多的人急匆匆地赶来。我们上了路,一个妇女把拖鞋顶在头上,也不看我们,自管说:“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,血流成河啊。连天神都逃走了。”她走远了。河边的树丛里,传出来女人尖厉的叫喊声:“*Nguwor gbor mu ma oo*,”真主帮助我们,还叫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:“尤素福,雅布,福迪……”我们看到不少走失的孩子只穿着内衣,夹在人群里走,一路喊着“*Nya nje oo, nya keke oo*,”妈妈,爸爸。人群中间还有狗在跑。虽然已经远离了伤害,人们还是跑个不停。狗四处嗅着寻找主人。我的心情紧张起来。

走了六英里,我们来到了外婆的村子卡巴提,村里已经空无一人,沙滩上只留下一串通往村外密林的脚印。

天黑下来,在矿区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。蝥蝥和鸟儿的夜鸣声听不到了,取而代之的是大人的低语声,寻找父母走累了的孩子们的哭泣声和饥饿的婴儿的痛哭声。我们坐在外婆家的露台上,一边听声音,一边等待着。

“伙计们，我们回莫格布维莫去好不好？”朱尼尔问。我们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一辆大众车从远处轰隆隆地开过来，路上的行人飞快地躲进旁边的树丛。我们也跑了几步，但没跑远。我的心在咚咚地跳，呼吸急促。那辆车停在外婆家门前，从我们趴着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车上没有人拿枪。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从树丛中钻出来，看到驾驶员座位上的那个人跑到路边吐了好多血。他的胳膊在流血。吐过后，他就哭起来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心里感到一阵刺痛。一个女人双臂搂着他，求他站起来。他这才站起身朝面包车走去。他打开驾驶员对面的车门，一个靠在车门上的女人滚落到地上，两耳冒血。人们连忙捂住自己孩子的眼睛。

面包车的后排座上还有三具尸体，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，座位和车顶上到处是斑斑血迹。我想远离见到的这一切，却挪不动脚。两脚麻木得没了知觉，整个身体都僵在那里。后来我们才得知，那个男人想带着全家一起逃跑，叛匪朝他的车一阵扫射，杀了他全家。那位搂着他的妇女安慰他，至少他还可以埋葬家人，这让他略微平静了一些。她说，他可以永远记住家人在何处长眠。她似乎比其他人对战争知道得稍多一点。

风停了下来，白天似乎很快地变成了夜。夕阳将落时，经过村子的人更多了。一个男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儿子。他以为儿子还活着。儿子的血沾了他一身。他边跑边说：“我要送你去医院，儿子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或许抱着这些虚幻的希望对他来说是必要

的,因为这可以让他逃离险境免受伤害。随后跑来的是一群中了流弹的男女。他们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上还滴着鲜血。有的人受了伤还不觉疼,直到别人指点他们的伤口时才发现。有人晕倒,有人呕吐。我觉得一阵恶心眩晕。我觉得地面在动,站在那里打着颤,人们的说话声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。

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。她背上背的是她的孩子,血顺着衣服淌下来,在她身后流了一路。她狂奔逃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。幸运的是,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。她跑到我们站立的地方,坐在地上,把孩子放下来。原来是个女孩,两只眼睛大睁着,脸上还挂着戛然而止的笑。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。母亲俯在女孩身上,使劲摇晃着。她悲痛惊骇至极,欲哭无泪。

我和朱尼尔、塔洛伊相对而视。我们知道,返回马特卢章已是必然,因为我们已亲眼看到,莫格布维莫已非家园,我们的父母也绝无可能留在那里。有几个受伤的人一再说,卡巴提是叛匪的下一个目标。我们可不想在叛匪来的时候待在那儿。连那些走路不便的人都尽力远离卡巴提。在返回马特卢章的路上,那个妇女和她孩子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,挥之不去。我对路程没有感觉,喝水也不觉得解渴,尽管我知道自己很渴。我不想回到那个妇女来的地方去,连无知的婴儿也明白,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

“那是在你出生前十九年。”每当我问起塞拉利昂在一九六